

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思考

陈学明

中文摘要:本文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问题为中心,讨论了以下8个具有全局性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1.澄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遗产;2.解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当代启示;3.解释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以及它在现代性问题上的辩证立场;4.阐释“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这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的意义;5.评析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帝国主义和经济理性的批判以及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概念的意义;6.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生态导向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在必然性;7.指出生态问题上要拒绝的三种错误战略,即回到前现代的浪漫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工业化战略、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战略;8.直面与生态问题有关的四大人类困境,即如何对待资本、如何对待技术、如何对待消费以及如何对待生产。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生态文明 生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结合中国的现实,特别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对其做出深入的研究,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获取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我们在这里作初步的尝试。

当今年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思想武器指导自己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之处是它富有说服力地告诉了整个人类：这种思想武器现成就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引出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做出了详尽而又深刻的研究。我们从他们的研究中领悟到，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3部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提出劳动异化概念而闻名。但实际上，马克思是把自然异化与劳动异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改造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而提出来的，其中一个重大改造就是把自然异化也纳入异化的范围。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又强调，包括土地异化在内的一切自然物的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还第一次引入了“联合”和“联合生产者”的概念。这是马克思对如何消除自然异化的深刻探讨。既然自然异化是由私有财产制度带来的，那么消除异化也就必须以消除私有财产制度为前提。那么如何消除私有财产制度呢？马克思在这里提出通过“联合”来实现。通过“联合”消除了自然异化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

《共产党宣言》常被一些人误解为是“反生态的”。这些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这种指责，实际上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来反对现代主义，即“隐含着一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在这一著作中赞美“自然力的征服”、“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可是看不出他们祈求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即并没有推崇

“毫无保留地”以牺牲农业、牺牲生态为代价的所谓机械化与工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揭示了伴随资产阶级文明而产生的各种资本主义矛盾，在所揭示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就有生态矛盾。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特征伴随着大多数人口相对贫困的增长”，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自然力的征服’伴随着自然的异化”，并且提出这种自然的异化“存在于作为资本主义核心问题的城乡分离之中”。而且正是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作为“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论》被公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但人们往往忽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实际上“新陈代谢”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深入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领域，从而展开了对“环境恶化”的深刻批判。马克思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说明“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相互作用”，又用“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来表述这样一个事实：“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最重要的是要知晓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的分析。阅读《资本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马克思的如下告诫：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

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知晓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容，而且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现实意义何在。这种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于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回答以下四个重大问题：

1. 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类理想社会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既然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类属于物质

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而两者原本非但不冲突，而且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是伙伴关系，它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 我们正面临着生态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究竟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它究竟会把我们人类引向何处去？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一方面在“应然”的层面上展开的，即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又在“实然”的层面上展开的，即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揭露了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之间是如何对立的。由于马克思是从哲学的高度，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了人与自然对立的实质，阐述了生态危机的本质，从而我们也可以从根本上认识生态危机的危害。

3. 当今人类至关重要的是要知道生态危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生态危机是人类追求现代文明的一个必然归宿还是可以消除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是与自然根本对立的，只要资本的逻辑在这一世界上还畅通无阻，那么，人类要走出生态危机就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4. 当今人类究竟如何着手去消除生态危机呢？固然消除生态危机是一项综合工程，它需要各种因素综合地进行，但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什么呢？由于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于资本逻辑，从而它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消除生态危机就是与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人类反对生态危机与反对资本主义应当是同步的。

二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今的生态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能够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择其要者有:

1. 透过人与自然的冲突去分析和解决人与人的冲突。在生态保护问题上,从表面上看问题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一般的人都认为,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自然危机,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相处的理念和方式出了偏差。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问题是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而根子还是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人的与自然相处的理念和方式的偏差,是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偏差,或者说是由社会制度方面的偏差所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我们这里出现的生态问题不能直接说这都是由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说与生态文明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但这并不等于说,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种“透过人与自然的冲突去分析和解决人与人的冲突”这一面对生态问题的基本思路对我们没有启发,在我们这里不适用。关键在于,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生态文明并不存在像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的根本对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尽善尽美,与生态文明是完全协调的。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生态问题与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完善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从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吸取启示,不是仅从技术等层面而是善于从制度和人际关系的层面去分析我们中国的生态问题,着眼于通过不断地改革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一切不完善之处,来解决生态问题。

2. 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历史的新发展,在承认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同时,仍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他们在理论上考察了社会发展与生态

问题的内在联系,提出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内涵,走向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的选择。这一点,显然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也会具有启示作用,并会给予莫大的信心和鼓舞。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中最值得人们深思之处。必须指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批判来论证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他们在生态运动中高高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这更显得难能可贵。他们围绕着生态文明的建设这一目标,为人们从整体的角度解释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异军突起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转折。我们目前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要求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因此,我们必须万分珍惜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3. 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创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结合在一起。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创建一种人的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新的存在方式。伴随生态文明的建设,定将是人的新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形成。他们要求人类自觉地把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变成创建人的新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过程。他们的这一观点对正在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人民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启发作用。尽管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从“应然”这个角度来论述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应当是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形成的过程,生态文明下的人的存在应当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占有”为主要标志的存在不同的新的存在,但是他们的论述对我们还是颇有启发,主要是使我们知道建设生态文明对我们来说究竟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是说应当朝哪一方向走。

4. 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论述生态问题时有一个共识,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他们都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生态文明能否真正建成,取决于能否完成这场思想革命。毫无疑问,这一点对我们的启发也非同小可。他们都致力于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认为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目前的整个文化系统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下,自然的生态系统已经被推向濒临崩溃的极限。目前世界上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程度也是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堕落的程度成正比的。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他们呼吁进行生态视角的思想文化审视。中共十七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写上了生态文明的内容,这不仅是我国发展战略层面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而且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相信通晓了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我们对此一定能有更深切的领悟。

三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正是借助于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才充分显示出来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为:

1. 废弃现代化还是医治现代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代表了生态运动内部一种企图走出后现代主义的困境,把绿色运动引向健康的现代主义的倾向。“红绿派”从生态运动中的“绿绿派”分化出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对抗的过程。后现代主义是冲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运动而来的。它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后现代主义不仅包含了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过程,而且还包含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矫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主

义首先不满的就是这种“超越现代的情绪”。他们同样对现代化的种种负面效应,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不否定现代化本身。他们不像包括生态中心主义者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否定工业社会,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他们不美化现代文明社会,也不全盘否定现代文明社会。他们不对现代化和现代性带有偏激的情绪。他们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

2.是否需要用生态中心主义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解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体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主—客”二分的存在,也反观了现代性的缺陷。主体有如写在沙滩上的字迹一般,可以抹去,从此以后,世界不再有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存在,而是物与物的关系。我们知道,现代主义推翻了宗教,消解了神性,使人性和主体浮现了出来。现代性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使主体和主体性得以确立。所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抗衡,首先做的是无情地批判主体。环境保护主义中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即“绿绿派”把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反主体性作了系统的发挥,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他们从反对工业化对自然的掠夺出发,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要用生态中心来取代人类中心。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般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在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提出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他们从“绿色政治”的营垒中分化出来,重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宗旨的新的生态政治。在哲学上,他们要建立一种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的自然观。

3.要不要用理性来纠正理性的偏差?现代主义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把矛头直指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竭力反对现代主义者主张用理性战胜一切、衡量一切的观点。现代化运动是借助于理性而阔步前进的。后现

代主义者以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为根据,强调理性一方面破除了旧的奴役、压抑,另一方面又由于设置了新的“权威”、“本质”、“中心”,从而带来了新的奴役、压抑。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社会的所有弊端都归罪于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的恶性膨胀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左右,进而主张消解理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也尖锐地批判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尽管也深刻地揭露了启蒙理性给现代人类带来了许多的不幸,但不对理性加以从根本上否定。他们强调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人们仍然只能用理性去纠正理性的偏差,理性本身并没有过错,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在他们看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去消解理性,而在于如何去恢复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如何使理性健康、有序地发展和发挥作用。他们不断地向后现代主义者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够不用理性方式而进行理性批判吗?他们在否定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经济理性的同时,又致力于重建和健全新的理性,即价值理性和生态理性。

4. 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功能?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敌视理性与敌视科学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理性与科学结盟,演变成单纯的“工具理性”,才给现代人带来如此多的灾难。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人类的负面效应亦愈加明显。他们在科技进步与人类幸福之间制造了一个反比关系,赋予科学技术一种原罪的性质。他们在反增长、反生产的同时,还反技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反科学主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发现大量揭露科学技术的使用如何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种种负面效应的言论,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他们并没有认为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效应完全是消极的,科学技术只有“负面作用”而没有“正面作用”,更没有把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作用说成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他们强调,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生产方式,包括使用科学技术的方式的危

机。他们对生态中心主义,乃至整个后现代主义敌视科学技术的行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5. 人类对意义的追求是错误的吗? 在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理论观点中,可能没有比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还原主义更引人注目了。后现代主义者坚决否认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否认本体论,否认有世界的最终本源、人的本质存在,否认“基础”、“原则”问题。由于传统哲学总要为世界,为人的存在,确立一个“始基”,后现代主义者就全面地与传统哲学相对抗。后现代主义从反本质、反基础出发,也反对建立在基于这种基础、本质而提出的各种社会理想。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为依据而形成的,从而科学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首先攻击的对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者把本体论问题虚无化。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错误不在于承认事物的基础、本质的存在,而在于把这一切绝对化、僵死化和封闭化,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把形而上学一棍子打死是不对的;从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者只是在形而上学封闭的“城堡”上凿了一个窗口,而实际上则彻底地摧毁了这一“城堡”。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面对生态危机,如此地无所适从,最后乞求于无政府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们缺乏本体论的根基密切相关。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对世界、人类意义的追寻与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注重于研究社会主义的存在根基。

四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和创造性集中反映在他们所提出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这一命题中。对正迷恋于消费主义之中的现代人来说,了解一下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是不无好处的。他们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他们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

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仰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便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的尺度。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这绝不仅仅是人们注意力的转移,而是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并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他们在消费领域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这是从“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的转移。他们在生产领域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让每个人都有施展才能的劳动岗位,并且使这种劳动成为自主性的行为,从而使劳动者从中获得无上的满足。

人类自进入文明状态以来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只是在消费领域内寻求满足,而把在生产领域的活动都视为只是谋取满足消费的手段。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这种错误愈演愈烈。生态马克思主义无疑主要是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一状况提出这一命题的,但这一命题的意义远远超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它对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跑、努力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和富裕的中国人民,也同样具有启发作用。具体地说,它起码有以下四点启发:

1. 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能仅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领域,即不能只为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根据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当然应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应使我们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进一步丰富起来。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永远只是手段,即这只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本质,促使人获得幸福与满足这一目的的手段。我们不能把手段误认为目的本身,具有了充分的手段,不一定就会自动地为目的服务,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使手段有效地为目的服务的问题。

2. 在消费领域,中国人民必须破除多多益善的旧观念,树立适可而

止、知足常乐的新观念，正像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要打破多与好之间的联系。要讲究消费的质，大可不必都一味地追求量，实现从量的标准向质的标准的转换。饮食讲营养，生活讲健康，文化讲高品位，环境讲清洁优美。特别是要改变那种追求新奇的、“为我独有”的消费理念，大力倡导消费那些不易损耗的、耐用的东西。如果不迅速改变目前满足消费的那种越多越好的方式，如果不在消费领域展开一场革命，资源、环境的继续遭受破坏不消说，西方的那种人与商品之间关系的颠倒，即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将会在我们这里重演。

3. 确确实实地把注意力转换到生产领域中来，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率先实施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的理念，尽管目前我们只能跨出很小的几步，但只要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就是中国人的大幸。我们必须牢记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消费，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组织我们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活动变成一场实践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劳动的解放不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

4. 当前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在进行“结构性的产业调整”、传统劳动岗位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确保人们都有自己的劳动岗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尽管劳动减少了但仍然让每个人能够劳动”的思想极有针对性，也极有现实意义。他们强调要把“挣钱的权利”和“劳动的权利”区别开来，不要用前者来替代后者，是一个深刻的见解。我们万不能把传统劳动岗位只是集中于一个人数很少的“劳动精英”那里，而让大多数人离开传统劳动岗位，沦为只能从事围绕着“劳动精英”转的服务性工作。对于广大下岗者和失业者来说，仅仅给予生活补助让他们能生存下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仅仅需要活下去，更需要一个能证明自身价值的天地。实践证明，让每个人都有活干的意义并不逊于让每个人都有饭吃。

五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它的影响之日益扩大同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反思和批判成正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建树主要见之于正当许多人借助于一大批社会主义的垮台之际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唱赞歌之时,它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展开更加激烈的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而这种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它与生态主义的分歧主要是在对造成现代社会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根源的问题上的分歧。生态主义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强调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直接导致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生态主义对现代社会中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的批判,基本上不涉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以及以后,生态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从这一基本立场倒退,而且由于一方面正视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做出了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使这一立场更坚定,更充分有力。他们不但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且又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eason)的范畴。这样,他们又从对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这是从较抽象的哲学层面上来探讨资本主义生态

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经济理性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的。当人们学会了计算和核算,即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生产之时,经济理性也就开始起作用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所以他们首先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揭示经济理性的危害。在进行这种批判的基础上,他们提出,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无法实施生态保护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实施的生产力的经济规则,即经济理性,是与生态理性相对立的,只要这一规则仍然在起作用,生态保护就是一句空话。经济理性不惜对资源的肆意开发,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而生态理性力图尽量少动用劳动、资本和资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以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而隐藏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理性背后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动机。在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支配下,实施生态理性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必然带来堵塞增长之源。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反复强调,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这就意味着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该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他们考察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揭露说,由于生态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这一制度又企图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转嫁和缓和矛盾。这就出现了“生态帝国主义”。他们批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高耗费、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也放到那些国家,掠夺那里的土地、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其他一切自然资源。针对一些人美化当今资本主义的种种论调,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可能有“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关于某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或某种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在理论上至今未得到清晰的表述,更不必说它可以在某种制度化的基础设施中得到

体现了。关键在于,环境的破坏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经济危机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总的来说,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事情往往是在变好之前早已变得更糟了。

六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的同时,反复说明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有可能使人从生态危机中走出来。受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必然联系的论述的启发,让我们阐述一下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进行。当今人们在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往往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特色”上,实际上,“中国特色”是个性,而社会主义是共性,对于“中国特色”的认识,是不能和社会主义截然分开的。离开了“中国特色”来谈论“社会主义”,固然有可能重蹈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和书本上的教条的覆辙,但是,离开“社会主义”来谈论“中国特色”,也有可能犯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错误。党的十七大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则是意味深长和富有针对性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而恰恰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在于创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真正满足属于人的功能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存在方式,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

值,那么,中国人民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也就必然会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其理由非常简单: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联系,即创立生态文明。

其次,“科学发展”的战略决定了这不是“黑色”而是“绿色”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好地解决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这个课题。发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面对的一个永恒主题,发展又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为之而抱恨和愁肠百结的全球性话题。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就在于“转变”,即把原先的那种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保护脱节甚至对立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的变化,都要求当代社会主义必须摆脱原先那种片面注重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出新的适应时代源流的发展模式,而当下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也为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提出创造了条件。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在中国首先被提出和首先加以实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科学发展作为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是黑色的发展而是绿色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不是黑色的崛起而是绿色的崛起。

再次,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基本任务决定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其主要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时,着重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常说“和谐社会”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或者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或者说人自身的主要功能和需求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立足,也无从说起。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寓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中。尽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必须以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为其社会条件,但毫无疑问,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必然成为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身之间和谐的基础,并且还会成为整个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时,实际上已经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地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生态文明纳入到了自己的主要议事日程。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生态文明的道路。生态文明社会就是最理想的和谐社会。

最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决定了通过人与自然的统一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社会主义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样公开申言要坚持“以人为本”。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不但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而且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要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意义上理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的“以人为本”的含义,那么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这一价值观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一清二楚了。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完成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甚至可以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实际上就是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而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追求,也就是把实现人与自然完全和谐高度统一作为自己最崇高的追求。

七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深刻地揭示和激烈地批判当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而且对如何走出生态危机做出了广泛的探讨。在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是值得借鉴的。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对下述三种战略应当说“不”:

其一,为了实现生态保护,放弃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一些人一听说要建设生态文明,马上缅怀起农业文明和渔猎文明,以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回到前工业化、前现代化去。他们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主张重新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社会理想。他们不了解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不了解我们所说的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必须在充分享受现代化的成果的前提才能得以成功。如果说在工业文明之前,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是和谐的,在整体上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冲突,但这种和谐是低水平的和谐。我们当今需要的并不是低水平的和谐而是高水平的和谐。我们不可能为了生态文明而放弃工业文明,不可能为了生态文明而去享用一切现代化的成果。我们不能以牺牲生态文明为代价来获取现代化,但同样,我们也不能以牺牲现代化为代价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其二,先实现现代化再说,待到工业文明建立起来了,再去想生态文明的事。因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以后的人类的一种新的文明状态,从而人类也就必须按照先工业文明后生态文明这一顺序走。我们这里一些人反复强调,中国重复发达工业国家走过的老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上环境受到破坏也是必然付出的代价。他们的基本战略就是现在聚精会神地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建立起工业文明,把生态文明暂时“悬置”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视为“未来式”。必须明确,选择这种发展战略很有可能现代化的成果还没有完全享受到,而沉重的代价已经把我们葬送掉了。再说,选择这种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认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工业道路,即认为这条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的基础之上的。可实际上,这条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不要说在像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值得存疑,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是否能做出判断已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也还是个问题。

其三,把原本应当由自己国家承担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一部分“转移”、“转嫁”给其他国家。发达工业国家以牺牲生态文明实现了现代

化,它们的现代化程度应当与环境恶化程度是成正比的。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在发达工业国家的生态状况尽管也令人忧虑,但总的来说要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这是由于它们实施“生态帝国主义”政策,强行把他们所制造的垃圾让发展中国家“吃下”的结果。问题在于,这些发达工业国家可以通过“转移”、“转嫁”的战略来缓解生态危机,那么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也能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既可以继续我们的现代化的进程又可以避免陷于生态危机之中?实际情形是,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不允许我们选择这种“转移”和“转嫁”的战略。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会这样做;其次,我们中国经济体量实在太大了,如果我们以如此大的体量加入到全世界的“转移”和“转嫁”的行列之中去,那么会带来空前的严重后果,显然这种后果也会损害我们自身;最后,实际上,经过发达工业国家的这么多年的一意孤行的“转移”和“转嫁”,所剩的空间已不多,蛋糕基本上已被它们分光了。看来,我们中国根本没有条件通过实施“转移”和“转嫁”战略来建设生态文明。

上述三种战略是我们所不应该实施的,我们能够实施的战略是推行以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既然我们下定决定既要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又不能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起码使自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把伤害生态环境这个代价降到最低限度,那么我们就不能做出上述三种选择,而必须制定新的战略。看来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在一起进行建设。换句话说,我们还在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必须以不伤害生态环境为前提。这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或者更简单地直接称之为“生态型的现代化”。这种“以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正是我们所能做出的正确的战略选择。尽管这条路径自古至今还没有人走过,但我们中国人必须把它走出来。“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使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相“脱钩”,努力完成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现代化的基本含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

的战略落实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上，就是实现“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既与回到前现代化去的战略相违，又是同“用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耗来换取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实现”的战略相对抗，更是对那种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取的“转移”、“转嫁”的战略的否定与超越。它不是立足于“转移”、“转嫁”，而是立足于“转变”。“转变”与“转移”、“转嫁”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大相径庭、冰炭不相容。“转变”就是改弦更张、否极泰来、另起炉灶。这种“转变”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发展观和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理论与发展方法的转变，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与运行机制的转变，甚至还包括工作作风和衡量标准的转变。

八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但他们也知道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困难重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正在于它深刻又生动地描述了当今人类既不愿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又力图摆脱生态危机的两难境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人类困境”与“两难境地”当今中国人已有切身感受。这里我们就顺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分析一下我们究竟处于怎样一种“两难境地”之中，以及究竟如何面对这种“两难境地”。

我们认为，这种“两难境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如何对待资本：既要利用又应限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与充分利用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在我们中国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正在用其无坚不摧的力量，布置、安排、摆弄我们周围的一切，与此同时清洗异己、他者。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的推动力是资本。而实际上，资本在当今中国尽管有着带来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等有目共睹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它也有着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在资本的所有负面效应中，最明显的是对自

然环境的损害。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难题:现代化事业离不开资本的支撑,没有资本的作用现代化事业就成了空中楼阁,但是,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必然置破坏生态环境于不顾,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对待资本呢?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所要实施的现代化不是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实施传统的现代化必然一味地利用资本,而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就不能完全拜倒在资本的脚下,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还应限制资本。

其二,如何对待科技:既要发展又应驾驭。我们国家现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国家的繁荣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完全正当的。问题在于,科学技术对人类事业的影响是完全正面的吗?实际情况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和欢乐,另一方面却又给人类制造了痛苦和烦恼。我们在科学技术对自然带来伤害的情景中看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严重对立。这样在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难题。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但科学技术又常常被作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而起作用,我们能不能做到使其成为只对生态环境,对人类有益的而不会有害的工具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建设生态文明才是有希望的。这里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有益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有害的工具,就看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着什么样的目的去加以使用。为了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还要驾驭、监督科学技术,从而使科学技术最大程度地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有益工具和强大手段。

其三,如何组织生产:既要扩大又应改变。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就是生产的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我们现在要实施的现代化是“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不断地扩大生产、发展经济仍然是一个既定方针。问题在于,我们从实施传统的现代化变为实施“以生

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在生产方式的组织等方面，我们是否也应当做出相应的改变。这里我们所要解决的难题是在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既要使生产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又要使这种生产不会变成“过度生产”，从而不会像“癌细胞”一样危及生态环境和人自身的生存。既然我们已下决心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走出来，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那原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也非得改变不可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去扩大生产、发展生产，还得不断地改变生产、调整生产。需要改变和调整的首先是生产的目的。为了实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而实施的生产就不能“为了生产而生产”，更不能仅仅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生产，这种生产应当明确地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必须是人的真正的需要，也就是说，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需要。

其四，如何组织消费：既要刺激又应引导。我们现在实施的不是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对消费的这种一味地加以扩大和刺激的方针，是不是需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来对此不难做出回答，但由于“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并不是不要人们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反地它也是以富裕的物质生活为前提，它也需要用消费来拉动生产，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所以造成人们在消费面前失去了方向，从而也使这个本来不难回答的问题成了一个难题。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去改变目前那种与生态文明不相容的消费模式。具体地说，对待消费我们既要刺激，又要引导，即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去引导消费。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多的，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但生活得却更好，这是可能的。为了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刺激消费、用扩大消费来促使经济的发展，而且更要引导消费，让消费不至于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ed Magdoff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hum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e gradually increased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underlie strong ecosystems; and then analyses why societies are not adequately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approaches; and finally indicates the possibility that we might us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natural ecosystems as a framework to consider a fu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atural ecosystems , environmental damage , capitalism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me Thoughts Inspired from Ecological Marxism

Chen Xue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discussed eight overall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problems as follows: 1, clarifying the heritage of ecological theory of classical Marxism; 2, Interpreting the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3, 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Marxism's critique on post-modernism and it's dialectical position on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4, illuminating the meaning of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as follow: Satisfaction of human being rest with production activities, but not consumption activities; 5, evaluating the critique on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from Ecological Marxism, and evaluating the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ation and social ration; 6, systematically discussing the internal necess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Eco – oriented socialism; 7, pointing out three error strategies on ecological problems, which include: back to pre-modern Romanticism, old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of pollution first and managing second, the strategy of Ecological Imperialism which passed the crisis to other countries; 8, seriously facing four dilemma of human being concerning ecological problems: how to deal with capital, how to deal with technique, how to deal with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post – modern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r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ment on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Agger ,O'Connor ,Foster as the representatives

Guo Jianren

Abstract:

The Marxism which Marx and Engel have founded has been developing until now. May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be regarded a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because the scholars of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have constructed all kinds of theories which aim to think and to resolve theoretically the far-reaching ecological problem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survival ? In this paper ,I will make an attempt to comment 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by Ben Agger ,James O'Connor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who are chosen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cent western